

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考据学贡献

陈晓华

余嘉锡(1883-1955)所著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是辨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第一部杰出学术专著。然而,有关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,尤其是对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考据方法,更是少有论及。像胡楚生《〈四库提要补正〉与〈四库提要辨证〉》^①,旨在揭示二书异同。廖璠《余嘉锡及其〈四库提要辨证〉》^②,则从考辨《提要》之得失、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之形成、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之思想方法三方面对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及余嘉锡的思想方法加以评述。可惜的是,这两篇文章均未涉及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考据方法。其他的,如廖璠《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研究》^③、滕兰花等《余嘉锡目录学思想初探》^④、赵元章等《简论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》^⑤、谢伟涛《章学诚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比较研究》^⑥等,亦未提及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考据方法。因此,作为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之本的考据方法,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总结。需要说明的是,此处仅就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成就言考据方法,至于辨证的缺失则略而不谈。

对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,余嘉锡认为:“《提要》诚不能无误,然就其大体言之,可谓自刘向《别录》以来,才有此书也。”^⑦他既以精审的学术眼光,指出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学术价值,又道出其中种种缺陷:“成于众手,迫之以期限,绳之以考成……校勘鲁鱼之时多,而讨论指意之功少……往往读未终篇,拈得一义,便率尔操觚,因以立论……纠谬之处,难可胜言。”^⑧为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误,余嘉锡下了很深的功夫。他博览群书,辨源流,审名实,广求证

①载《中国目录学研究》,华正书局,1987年。

②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1999年第2期。

③《图书馆论坛》1995年第2期。

④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》1999年第2期。

⑤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4期。

⑥《图书馆》2004年第3期。

⑦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48页。

⑧同上,第49-50页。

据,大量搜集资料,加以系统化,力求把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。以自己扎实的功底、渊博的学识,运用各种考据方法,“搜集证据,推勘事实,虽细如牛毛,密若秋荼,所不敢忽,必权衡审慎,而后笔之于书”^①,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490篇提要做了大量精审的考辨补正工作。

一、运用目录版本之学进行考据

利用目录版本进行考证,是清代考据学家常用的方法。而且,他们还把目录与版本结合起来,进行考据。清代卓有成就的学者,对此多有体会。如钱大昕以考据为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,综合运用校讎、版本等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,注重目录学在研究、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,并在考证、校勘、辑佚、辨伪的过程中发展了目录学,《补元史艺文志》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目录版本学思想,实践了以目录版本进行考据。其后,章学诚提出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把目录学的功用进一步理论化。姚振宗对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做出了进一步阐释。认为目录学,言其粗,则胪列书名,略次时代;言其精,则六经传注之得失,诸史记载之异同,子集之支分派别,各具渊源。同时,他还指出,目录学“有校勘之学寓乎其中,而考证之学且递推递密至无穷尽也”^②。强调目录学必须运用校勘学、版本学、考据学的知识与方法,充分认识到了目录、校勘、版本与考据的紧密关系。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等,即是姚振宗以目录、校勘、版本进行考据的理念的优秀成果。这一考据方法,在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再次得到了继承发扬。

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,余嘉锡注重以版本定是非。因为版本正误是史实正误的关键,通过版本亦可以判断书籍的优劣和材料的真伪。如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提要以《资暇集》之说为准,定元恪名作“玃”,并且引《隋志》及《释文》来佐证。但提要根本没注意到它所选的《隋志》,其版本实是“误本”。据正本明南监本《隋志》,“陆机”的“机”字,当从“木”,而不是从“玉”。余嘉锡在辨证此条时,抓住提要选择版本的失误,使其立论不攻自破^③。关于《靖康要录》与《宋钦宗日录》为同一书的记载,见于王闻远《孝慈堂书目》。该书著录《宋钦宗日录》二卷,并在注中明确指出此《宋钦宗日录》即《孝慈渊圣皇帝要录》。不过,最后使二书同书异名的事实成为定论,是余嘉锡通过考查版本册页来完成的。余嘉锡认为《靖康要录》与《宋钦宗日录》“虽卷数多寡不同,然有六册四百十番,与今本叶数亦约略相当,知其必是一书”^④。在《伤寒论注》附《伤寒明理论·论方》提要辨证中,余嘉锡详叙版刻源流,以不可辩驳的事实

①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52页。

②陶存煦:《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。

③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,第34页。

④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靖康要录》,第230页。

指出,清人喻昌作《尚论》篇,归罪“王叔和编次之舛,序例之谬”^①者,是不明版本发展情况所致。王叔和本编有《张仲景药方》15卷,又取《伤寒卒病论》别行以为10卷。流传中,别行者被后人淆乱,二书遂混为一书,即金成无己作注、宋林亿等校之《伤寒论》。此书已非王叔和原本,所以遂有馆臣所见的编次、序例等方面的舛谬。通过考证版本源流,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为王叔和正了名。

余嘉锡将目录、校勘、版本合为一体的作法,跳出了自宋代以来目录学是否隶属于校勘学之争。刘向编撰《七录》之始,校勘工作也开始了,目录工作的完成及优劣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,二者实际上同出一源。但目录、校勘又不完全等同。编撰目录除伴有校勘工作外,还有辨明学术、介绍梗概、撰写书录等功能,这是校勘学所不能涵括的,为目录学所独有。因而,章学诚、姚振宗将目录学隶属于校勘学就未免拘囿一面,以偏概全。余嘉锡的作法,则在充分肯定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大前提下,指出了彼此的依托关系及区别,避开了隶属问题之一。这是文献学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一门专学后,学者们对文献学各分支学科再思考的结果。其学术视野自然比传统旧学更宽广,为现代学术对传统学术的革新,显然更高明。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绝大部分提要的辨证都注重了这三种方法的结合。如《宋书》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认为,沈约所作表,唐代以前早佚,所以今本不见有表。余嘉锡通过时代最近的相关史书及目录书的记载,指出刘知几《史通》谓《宋书》“为纪十,志三十,列传六十,合百卷”,却不言其有表。如果《宋书》的表在唐以前已佚,作为唐人的刘知几“不容不知”,而《隋志》亦未注“梁有表几卷,亡”^②,可见沈约本未作表,提要所说为非。关于《宋书》提要辨证,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既有目录书的引证。如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馆阁书目》、《崇文总目》相关内容的引用;有版本的比勘。如宋本、武英殿本与今本之间的比较;有校勘方法的运用,如有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二三《宋书·少帝纪》与涵芬楼据嘉业堂所藏宋蜀大字本影印本《宋书·少帝纪》,以及今本《宋书》的对校。有今本《宋书·少帝纪》与《南史》及《太平御览》同一内容进行的他校,和为考证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今本《宋书》卷帙已失原貌”等而进行的理校。由此,达到了精密的考证效果^③。又《魏书》提要辨证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有《崇文总目》及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等书目的引用,有宋刻本、明南监本、北监本、内府刊本、殿本与今本的比刊对校,有广引相关资料以作勘核的他校法的运用,以及由此而运用的理校法。多种方法的综合,有力地辨证了《魏书》提要的有关

①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伤寒论注附伤寒明理论·论方》,第648-650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宋书》,第143页。

③同上,第142-150页。

失误^①。又辨证《东观汉记》提要,亦复如此^②。

二、寻源溯流,考辨典籍与作者真伪

以辨伪来定是非,乾嘉学者取得了卓越成就。姚际恒、阎若璩、崔述等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也体现了他对乾嘉辨伪传统的继承与发扬。

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,余嘉锡完成了乾嘉学者辨而未果或有误的一些论题。如关于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》、附《黄帝内经素问遗篇》提要,余嘉锡通过辨伪,在肯定提要判定《黄帝内经素问遗篇·刺法论》为依托确实不误的同时,指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对“初非温舒之所伪托,其注托名于王冰”的失查。在这个过程中,《黄帝内经素问遗篇》中的另一篇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忽而未举的《本病论》,也因之得以揭橥于世^③。通过辨伪,不但澄清了虚实,而且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辨伪未明就率尔立论的弊病,也被鲜明地揭示了出来。

对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究竟何人何时所作进行的辨证,是余嘉锡运用辨伪法的突出例子。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何人何时所著,历来说法纷歧繁复。有道神农所作,有言黄帝臣子歧伯所作,有称子仪所作;有认为周秦以前书,有认为周末之书,等等。对此,余嘉锡采用了多种辨伪方法,寻源溯流,一一辨别识正诸说:以文字来辨识。如以《本草经》中的文字不类周以前的文字,来排除其为周以前的作品,所谓“时移世异,文之与史,皎然异辙”;以目录著录情况、时代特征及推理来核实。他首先通过目录著录与否,判定《本草》为六国时人扁鹊弟子子仪所著。因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著录《本草》,而《中经簿》则有《子义本草经》。接着,进一步推证,贾公彦谓《中经簿》并不说神农,可见《神农本草》之名,乃是后人推其学之所自出以题其书。子仪著书,当与神农尝药的功劳相埒,所以郑康成才把他们相提并论,“否则子仪不过扁鹊群弟子之一,与子明子术等耳,何所取而跻之神农之列耶?”对于若为周秦人所作,“何为不著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”的疑问,余嘉锡指出,此乃古书体例所致。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,有自一书之内析出数篇别行之例。《本草》本属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《扁鹊方》之一篇,汉魏以后析出别行,不见著于先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,却被后来者《中经簿》载录,实属正常。并且周秦两汉之书,不皆手著,多出后人撰次,弟子的论述常常依附先师以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著者的名字就常常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。因此,《本草》一书虽得以流传,作者自己反而可能被遗忘而名姓不传^④。《本草》一书作者终告显明,而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公案也终告了结。

①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魏书》,第158-178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东观汉记》,第239-258页。

③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卷》,第676页。

④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,第682-689页。

需要指出的是,余嘉锡的辨伪亦是审慎的。他通过“世之好以辨伪自负者,遇己所不知,其慎之哉”^①等话语来传达辨伪宜慎的观念,并以之告诫世人。这与乾嘉以来某些辨伪争一时意气与得失,是截然不同的。

三、运用历史避讳知识进行辨证

避讳是我国封建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,为帝王讳、为尊者讳等等,而各朝所讳又不同,方法也各异,这大大增加了后人阅读古书的难度。但在另一方面,利用避讳又可以考证古书的写作与刊刻年代等问题。南宋时洪迈、王应麟均运用了避讳知识进行考证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三《考史》言:“梁武帝曰:‘应天从人。’致堂谓:《易》之《革》曰:‘顺天应人。’未闻‘应天’也。为是言者,不知天之为天矣。愚按:梁武之父名顺之,故不云‘顺天’,避讳也。后人应天之语,盖袭其误。”乾嘉学者钱大昕也精通避讳学。陈垣1928年成书的《史讳举例》则继承宋以来学者对古代避讳的研究成果,对历代避讳的方法和种类,以及利用避讳进行考证的各种途径,进行了总结,使避讳学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专学。深得传统文化厚养的余嘉锡,在避讳得到总结的20世纪著述《四库提要辨证》,又加以与陈垣的交情,自然颇注意运用避讳学考史。因此,运用避讳学考史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是较突出的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所述《中兴小纪》,本名《中兴小历》,馆臣为避高宗讳而改“历”为“纪”,但这个改正实际上是馆臣在避讳方面的失当。余嘉锡通过考查历代因避讳而改书名的情况,发现大抵是用意义相近的字来代替,从未有随意以一字代替者。因此,按理,《中兴小历》的“曆”字则应以意义相近的“歷”代替。只有如此,方符合清朝“著于功令”^②的规定,也吻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本身的避讳规则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之书涉及“历”者,并未尝改易书名。如《系年要录》、《靖康要录》等条下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皆有“日历”字,未尝改为“日纪”。又《历象考成》《历算全书》等,皆只用代字,亦未尝改书名,但在《中兴小纪》书名的避讳上,馆臣却忽然独创一例,改“历”为“纪”,“按之功令既不合,推之全书复不通”,唯一行得通的解释就是馆臣自己没有运用好避讳方法,致使“进退失据,自相抵牾”^③。又《荀子》提要,馆臣认为荀子“汉人或称曰孙卿,则以宣帝讳询,避嫌名”。这种说法虽很流行,但《四库提要辨证》指出,汉代本不避嫌名,避嫌名之例是三国以后才出现的。通过避讳知识的考查,准确纠正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这一错误^④。

①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剑侠传》,第1174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中兴小纪》,第224页。

③同上,第225页。

④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荀子》,第519-520页。

四、运用现代科学的逻辑方法综合考证

如关于《尔雅注疏》提要,在辨证作者为何人时,余嘉锡比较了张辑《上广雅表》、郭璞《尔雅注序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叙录》、《大戴礼·小辨》、卢辨《尔雅注》、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等家之说的异同,揭示其中的正误优劣。同时,一步步分析归纳,进而揭示出张辑、陆德明以《尔雅》为周公所作的荒谬,得出《尔雅》作者正如经传所言“莫言其人”,只能推断出应为汉代人所作、时间在西汉平帝以前的结论。而提要在援引张辑、陆德明之说时,却不辨是非,实际上表明了它根本无意祛惑解疑^①。

又关于《崇文总目》提要,在关于郑樵删《崇文总目》序释问题的辨证上,余嘉锡首先列举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《崇文总目跋》对此的见解,指出其说正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所本。然后加以分析归纳,指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并未对朱说加以考证,便率尔依附,“矜为创获,言之凿凿”,进而把删《崇文总目》序释归于郑樵。接着列举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卷二十五《崇文总目跋》的观点,与朱说比较,指出朱说实际上已被杭说驳正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《滇略》、《疟症论》、《本草乘雅半偈》、《天禄识馀》、《宣德鼎彝谱》等书提要中皆曾引其说,而其《崇文总目》提要偏偏对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卷二十五《崇文总目跋》不加称引。其原因,余嘉锡推测,“岂非朱氏之说,先入为主”。因此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对抗世骏后出之说“忽而不之察”。按照一般的看法,似乎答案已经得出,可以结题了。但余嘉锡仍探赜索隐,指出杭世骏以今本《崇文总目》的序释部分被传抄者删去,来解释《崇文总目》序释见阙之说,亦未尽然^②。并将杭世骏之说的不足与钱大昕之说比较后,指出钱大昕《养新录》卷十四对《崇文总目》的分析才是正确答案。原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所择之本,即绍兴中颁下诸州军搜访之本,有目无释,只不过是取其便于寻检而已,并非因郑樵之言而有意删之,事实是“渔仲以荐入官,在绍兴之末,未登馆阁,旋即物故,名位卑下,未能倾动一时。若绍兴十二年,渔仲一闽中布衣耳,谁复信传其言者”^③。如此“一波三折”地反复比较推理,方最后立论,为郑樵正名则水到渠成。综观整个辨证过程,余嘉锡不仅广稽众说,分析比较,且能鞭辟入里,发微抉隐,显示出深厚的辨证功力。

应该指出的是,在运用这些方法时,余嘉锡并非简单罗列一二例子,而是尽可能涸泽而渔,穷尽相关材料,加以梳理比勘,理清来龙去脉,展示演变过程,做出合理合情的论断。

①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尔雅注疏》,第87-92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崇文总目》,第487页。

③同上,第488页。

五、考证与经世联系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亦充分体现出余嘉锡的爱国热情,凡有关社稷民生处,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爱憎分明、辞气激昂,这无疑使《四库提要辨证》的考据极富现代学术意识,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之学所能涵括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始作于1890年^①,1931年“删除重复,编为目录,合经史子集四部,凡得七百余篇”^②,始有定本。1937年7月,因日本入侵,害怕几十年的心血因战乱而付之东流,于是取史、子二部写定稿220多篇排印。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近一半的篇幅,实写于国家动荡之秋,成于民族危亡之际,可以说与国家生死、民族危亡休戚相关。在国难当头的年代,余嘉锡以春秋时楚囚“钟仪”身比。身处沦陷区的他,在授课时常引顾炎武《与友人论学书》所云“博学于文,行己有耻,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”来教导学生^③。此间,他所作的学问,有学者认为,在当时沦陷区自有其“正士风、励志节的深刻意义在”^④。其实,这也是他的一贯风范。他平日常说的是,“读书第一是讲究做人,第二才是讲究做学问。否则有学无行,读了书有什么用”,“凡事当明辨是非,不可从风而靡,不可见利而忘义。当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^⑤。所以在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中,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他对爱国志士及其民族气节的歌颂。《心史》提要的辨证,表现尤其突出:“郑思肖《心史》称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。’其藏书之日为德祐九年,宋已亡矣,而犹日夜望陈丞相、张少保统兵外来以复土宇,至于痛哭流涕,而祷之天地,盟之大神,谓气化转移”^⑥,蕴爱国之心涵慷慨之志。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以郑思肖《心史》记事有误,便断言必是明末好事之徒所作的欺世伪书,阎若璩、曹溶、全祖望也怀疑它的真实性。当年,《心史》及其作者的忠贞气节、民族精神,正好触犯了四库馆的禁忌,指定它为伪书,本就牵强。对它的真伪的论争,也就并非只是证明书籍本身真伪那么简单,而关涉爱国之志、民族之气节。因此,余嘉锡通过郑氏后人郑敷教及顾炎武诸人,以及与《心史》相关的各书及一些序跋对其真伪的认识及反应等方面的详加考证,多方论辨,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肯定了《心史》的存在。他正色指出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这个失误,差点泯没了百年未遇的佳作。他说:“若摘其一二失误,遂指此数百年来绝无仅有之书为伪作,使学者弃置不读,或读之

①刘梦溪主编: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余嘉锡卷·余嘉锡先生学术年表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6年第489页。

②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序录》,第46页。

③周祖谟、余淑宜:《余嘉锡先生传略》,载《余嘉锡文史论集》,第681页。

④转引自李学勤:《余嘉锡先生小传》,载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余嘉锡卷》。

⑤同③。

⑥余嘉锡:《四库提要辨证·心史》,第1532页。

而不敢信，沮后人爱国之心，而长勅敌方来之焰，此则吾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也。”^①正是余嘉锡的辨证，使《心史》的本来面目得以还原，使其以铮铮信史展示其无比宝贵的价值。因此，余嘉锡对《心史》的辨证，站的高度是相当高的。

有史以来的事实证明，操守一贯者，处危境时，往往不至于沦丧气节、羞辱生死。因此，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在关涉此类问题时，便浓墨重彩，极力铺陈。如在辨证《古今姓氏书》时，考查邓椿世系，指明邓氏为忠臣之后，目的就只在让忠奸家系泾渭分明，虽有偏执之嫌，但作者爱憎分明的精神醒然在目。“洵武之与孝甫，其为人如冰炭之不相容，椿年为孝甫之曾孙，而椿则洵武之孙，籍贯不同，宗支亦别，恶可混而为一，使高士之胤，忽作权奸之后乎？”^②他又口诛笔伐跻身权奸之门的伪君子，如投靠南宋奸相秦桧，以及附和秦桧卖国、擢秦桧篡位的吴曾之流。因此他对赵彦卫在《云麓漫钞》中对吴曾的议论深表赞赏，誉之为“诛心之论”，并详审其中文义，强调吴曾本“献媚权奸，实一偷合苟容”之流，著书“反自称不能委曲时好，一似以气节齟齬于世者，欲以此惑后人而掩其丑”^③，借赵彦卫之口，有力地诛伐了吴曾的险恶用心。但余嘉锡并不满意于“《提要》之所以罪曾者”，认为“尚未足以尽曾”，继续深入考证，探究其里，揭露吴曾的丑恶嘴脸，以有力证据指出“乞禁鹿胎冠子及议九锡者，即曾也”^④。令吴曾卖国谋逆的罪行彻底暴露无遗，方以为快。对既仕刘豫又仕金，而后再归于宋的杨尧弼，斥责其“反复狙诈，导夷狄祸中国以为己利”而又作《伪豫传》、《归朝录》以欺世盗名的可耻。余嘉锡在《伪豫传》提要辨证中奋笔诛伐之，意在使后世学者知其丑恶^⑤。对宋代的中兴诸将，栉风沐雨、出生入死、破金人、收失土、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宗泽、岳飞等名将则大加褒扬。余嘉锡身当家国如危卵之时，重视古人立身行事，愤恨卖身求荣之人，通过考证揭示隐微，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抨击奸佞，表彰忠义，爱憎分明，无所宽假，其爱国用心是良苦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

①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心史》，第1540页。

②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古今姓氏书》，第977页。

③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能改斋漫录》，第879页。

④同上，第882页。

⑤余嘉锡：《四库提要辨证·伪豫传》，第375页。